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詩經

导读

陈子展
杜月村 著

巴蜀书社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诗经导读

陈子展
杜月村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责任编辑：周田青
封面设计：陈世五

诗 经 导 读

陈子展 杜月村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875 插页4 字数240千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850 册

ISBN7—80523—336—5/I·152

定价：4.53元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编委会

主编 蔡尚思

编委 陈子展 谭其骧 顾廷龙
胡道静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根深叶茂。今天的中青年同志，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着这一宏富的历史遗产，因此，对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用新的方法进行反思和扬弃，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让它在“四化”建设和世界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是广大中青年应尽的历史责任，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要正确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扬弃，必须从直接阅读古代文化要籍入手。面对这些要籍，不少中青年同志苦于有关文化修养的障碍，亦苦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无法深入中国古代文化要籍的堂奥探幽致远，因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反思和扬弃。基于此，我社决定为广大中青年同志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这套丛书从中华文化的“根”出发，撷取其中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著作。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分册导读，使广大中青年同志能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学习、了解、深入中国文化的主要典籍，取得较大收获。

这套丛书，重点在“导”，要通过这套丛书引导广大中青年同志正确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引导他们深入发掘曾长期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文化瑰宝；引导他们辨别和扫除窒息人心的毒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每本要籍导读的作者，大都约请对该古籍素有研究，成绩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第一流专家担任。

丛书每种一般不超过二十万字，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导言，这是全书之重点，其中不仅要介绍该要籍的作者与全书概况，而且要介绍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并着重从方法上对读懂要籍给予具体指导，即讲解清这部书怎样才能读懂，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将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这部书的途径和应当阅读的有关著作。第二部分是该要籍的精选和简注。导言和简注不仅要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同时亦要反映导读者多年的研究之得并适当吸取当前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本丛书由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思先生担任主编，并由蔡尚思、陈子展、谭其骧、顾廷龙、胡道静、黄葵等先生组成编委会，负责指导丛书的工作。

总之，本丛书希望搞出新的风格和特点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帮助解决广大中青年的学习难点，也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但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不吝赐教。

巴 蜀 书 社

目 录

导 言

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	(1)
(一)《诗经》的书名和篇目·····	(1)
(二)《诗经》产生的时代·····	(3)
(三)《诗经》产生的地域·····	(9)
(四)《诗经》的作者·····	(10)
二、《诗经》的编订与分类·····	(12)
(一)《诗经》的编订·····	(12)
1.关于采诗说·····	(13)
2.关于删诗说·····	(14)
(二)《诗经》的分类·····	(17)
1.何谓“风”·····	(17)
2.何谓“雅”·····	(18)
3.何谓“颂”·····	(21)
三、《诗经》的思想内容·····	(24)
(一)关于生产劳动方面的·····	(24)
(二)关于爱情婚姻方面的·····	(28)
(三)关于徭役战争方面的·····	(33)

(四) 关于政治讽刺方面的·····	(35)
(五) 关于史诗·····	(38)
四、《诗经》的艺术特色·····	(41)
(一)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41)
1. 何谓“赋”·····	(41)
2. 何谓“比”·····	(42)
3. 何谓“兴”·····	(44)
(二) 形象的刻画和丰富的想象·····	(46)
(三) 语言形式的特点·····	(48)
1. 用语灵活·····	(48)
2. 用韵自然·····	(51)
五、《诗经》的传习和研究·····	(54)
(一) “赋诗言志”和“群籍引诗”·····	(54)
(二) 四家诗的传习·····	(57)
(三) 关于《诗序》·····	(63)

《诗经》注析

国 风·····	(70)
周南·····	(71)
关雎(71) 卷耳(73) 桃夭(75) 采芣(76)	
汉广(77)	
召南·····	(79)
行露(79) 羔羊(80) 鵲有梅(82) 小星(83)	
野有死麕(84)	
邶风·····	(87)

柏舟(87) 燕燕(90) 击鼓(91) 谷风(94)	
北门(98) 北风(99) 静女(101) 新台(103)	
邶风	(105)
柏舟(105) 墙有茨(106) 居子偕老(108)	
定之方中(111) 相鼠(114) 载驰(115)	
卫风	(118)
硕人(118) 氓(122) 伯兮(126)	
王风	(130)
黍离(129) 居子于役(131) 扬之水(132)	
兔爰(134) 葛藟(135) 大车(137)	
郑风	(138)
将仲子(139) 大叔于田(140) 女曰鸡鸣(144)	
东门之墠(145) 风雨(146) 出其东门(148)	
溱洧(149)	
齐风	(151)
鸡鸣(152) 还(153) 东方未明(155) 南山(156)	
魏风	(159)
葛屨(159) 汾沮洳(160) 陟岵(163) 伐檀(164)	
硕鼠(166)	
唐风	(168)
蟋蟀(168) 鸛羽(170) 葛生(172) 采芣(174)	
秦风	(176)
驪驹(176) 蒹葭(178) 黄鸟(180) 无衣(182)	
陈风	(184)
衡门(185) 墓门(186) 月出(188) 泽陂(189)	
桧风	(191)

隰有萋楚 (192) 匪风 (193)	
曹风	(194)
蜉蝣 (195) 下泉 (196)	
豳风	(198)
七月 (199) 鸛鳴 (206) 东山 (208) 破斧 (212)	
雅	(214)
小雅	(214)
鹿鸣 (215) 伐木 (217) 采芣 (220) 鸿雁 (223)	
斯干 (225) 无羊 (229) 节南山 (232) 正月 (237)	
十月之交 (244) 雨无正 (249) 小旻 (254) 小弁 (258)	
巧言 (263) 巷伯 (267) 蓼莪 (270) 大东 (272)	
北山 (278) 大田 (280) 宾之初筵 (284) 隰桑 (289)	
苕之华 (290) 何草不黄 (292)	
大雅	(293)
大明 (294) 绵 (299) 生民 (305) 公刘 (310)	
荡 (316) 桑柔 (320) 瞻卬 (329)	
颂	(334)
周颂	(335)
噫嘻 (335) 载芟 (336)	

导 言

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诗歌选本。它产生于商、周之交，到春秋中叶或稍后这样一个约五、六百年漫长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先民对自己社会生活的歌唱，是我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的篇章。这里先把《诗经》的书名、篇目的编排及其产生的时代、地域和作者，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一）《诗经》的书名和篇目

《诗经》，原先只称《诗》，或称《诗三百》，并不称为《诗经》。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对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总结《诗》的旨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他主张学《诗》贵在实用，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可见孔子言《诗》，但称

《诗》或《诗三百》，不曾提到《诗经》这个名称。

把《诗》和“经”联系起来加以论述的，则先见于《庄子》和《荀子》。《庄子·天运篇》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视“经”为典册书籍，《诗》为六种典籍之一。《荀子·劝学篇》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视“经”为学习的科目。《荀子》把培养人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所开设课程也有先修和后修的不同。而《诗》则为先修课程之一。“经”作为一般典册书籍的通称，在这里则赋予了道可常行于“天地之间者毕矣”的意义。于是，六书称为“六经”，成为儒家宗奉用以教育门弟子必读的典籍。而《诗》在“六经”中则居于领先的地位。

到了汉代，汉武帝首先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章六经，提倡读经的政策，尊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皮锡瑞《经学历史》）以经取士，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经；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利禄之辈，也往往皓首穷经。由是，“诗”作为“经”，又被官方确立起权威的地位。

现存《诗经》有三百零五篇，所谓《诗三百》，乃就其成数而言。但就《诗经》的篇目看，却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小雅》里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六篇，被认为是用笙管吹奏伴唱的“笙诗”。《毛传》认为，“笙诗”原是有词的，后来失传了。朱熹《诗集传》认为，“笙诗”原为乐曲名，在演唱时，以笙插入伴奏，原是有声而无词

的。这两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因现存《诗经》实为三百零五篇，故相信朱说者较多。惟时代相隔久远，而又史无确据，争论下去，似无多大意义。

《诗经》三百零五篇，分别编排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分十五，共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有诗一百零五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有诗四十篇。

《国风》诗篇，按国别加以编排。《雅》、《颂》诗篇的编排，则以十篇为一组，以每组篇首的篇名为组名。如《小雅》从《鹿鸣》到《鱼丽》十篇，就称之为《鹿鸣》之什。《大雅》从《文王》到《文王有声》十篇，就称之为《文王》之什。《周颂》从《清庙》到《思文》十篇，就称之为《清庙》之什。十篇以上带有零数的诗篇，不另立篇什，就编排在最后的一组篇什之内。如《小雅》从《鱼藻》到《何草不黄》有十四篇诗，《瓠叶》以后四篇就编排在《鱼藻》篇什之内。《大雅》从《荡》到《召旻》有十一篇诗，后一篇《召旻》就编排在《荡》篇什之内。如不够十篇诗的虽分组，但不立篇什。如《鲁颂》只有四篇诗，《商颂》只有五篇诗，两颂各自成组，不立篇什。这种以十篇为组的编排方式，也许有其翻检阅读的便利；从篇什与篇什之间，篇与篇之间看，也容或有某些相似相近之处；但作为组诗，似乎看不出彼此间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二）《诗经》产生的时代

《诗经》产生的时代，拟按《颂》、《雅》、《风》的顺序

谈下去。

《颂》诗产生的时代 《颂》诗产生的时代，最有争议的是《商颂》。故提到前面来先谈。一种说法，认为《商颂》是商王朝祭祀先祖的乐歌，时代较早；另一种说法，认为《商颂》是春秋时正考父歌颂宋襄公的宋诗，时代较晚。持前一说法的先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为什么正考父要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师呢；这在后于《国语》的《毛诗序》里就有较为具体的说明：“《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意谓《那》是汤孙祀成汤的乐歌，与《殷武》是殷人立庙以祀高宗之乐歌一样，都是商诗。商王朝崩溃之后，一部分乐官入周，《商颂》也可能随乐人转到周太师的乐府。而殷商后裔宋国统治阶级，不忘殷祀，作为有名的《商颂》，能不世代相传，保存下来？但到了戴公的时候，政局动荡不安，礼乐废坏，《商颂》由是失其声之曲折，逐渐散亡。正考父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并校勘文字，审定音节，才复其旧观。惟最后编订成书时，不知什么原因，十二篇只剩下五篇了。持后一说的，见于司马迁《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之所以兴，作《商颂》。”裴驷《史记集解》说：“《韩诗·商颂章句》亦美襄公。”认为《商颂》是正考父为歌颂宋襄公而写定的，是宋诗。

《殷武》诗发端说：“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毛传》解释说：“殷武，殷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国也。”《郑笺》补充解释说：“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挾然奋扬威武，出兵讨

之。”毛、郑明指《殷武》一诗是歌咏殷高宗伐楚之事。而持《韩诗》意见的魏源却认为：“《殷武》，美襄公之父桓公会齐伐楚也，殷高宗无伐荆楚事。”（《诗古微·商颂诗序集义》）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宋人苏辙的《诗传》里就作了辨析。他说：“近世学者因此诗有‘奋伐荆楚’，则以襄公伐楚之事当之，遂以韩婴之说为可信。予考《商颂》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诗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玄鸟》）‘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殷武》）此类非复诸侯之事，无可疑者。襄公伐楚而败于泓，几于亡国，此宋之大耻，既非所当颂，而《长发》之诗，谓汤武王，苟诚襄公之颂，周有武王，岂复以命汤哉？”苏氏已有力地批判了《商颂》美宋襄公的说法。

魏源又说：“楚入春秋，历隐、桓、庄、闵止，称荆，至僖二年始称楚，安得高宗即有伐楚之名？”（《诗古微·商颂、鲁、韩发微》）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宋人严粲的《诗缉》里也已作了解释。他说：“《解颐新语》或谓成王始封熊绎于荆，至鲁僖公元年始有楚号，遂疑商时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实《韩诗》宋襄公作《商颂》之说。殊不知《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乃在南，而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盖雍州之荆也。诗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别荆岐耳。孰谓周始有荆楚哉？”严氏已有力地否定了商时未有荆楚的说法。而且，荆楚作为州国之号，可以称之为荆，也可称之为楚；故或称荆或称楚，或合称荆楚，都无不可。所以，《殷武》诗是歌颂高宗奋伐荆楚之事，应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正考父作《商颂》的问题，皮锡瑞极力为司马迁辩护。

他说：“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岁而后能〔与襄公〕相及也。乃《宋世家》仍用考父颂殷之语，其说必有所受，断无自相矛盾。……”（《诗经通论》）皮氏所称，多属旁推之词，并无确实的论据。《毛诗序》说：“正考父得《商颂》”。《论语》说：“正考父校商之名《颂》。”都说明《商颂》非正考父所作。而且，正考父是宋戴公时代的人，距宋襄公时代相去约一百三、四十年，也不可能作颂以美襄公。对此，王国维已作了论断：“闵马父以《那》为先王之诗，而非正考父自作也。”（《说商颂下》）当然，正考父校《商颂》或得《商颂》，使《商颂》得以流传下来，其整理和保存古籍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鲁迅先生认为：“要之《商颂》五篇，事迹分明，词亦诘屈，与《尚书》近似，用以上续舜皋陶之歌，或非诬欤？”（《汉文学史纲要·书与诗》）推鲁迅之意，《商颂》就是商诗。我们对今古文家有关《商颂》的争论，并结合金文等地下出土有关资料加以分析，可以认定《商颂》是商诗。周满江先生对《商颂》，也根据前人成说和新近发现的有关资料加以分析，认定“《商颂》应是商朝晚期的颂歌”。（《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此，《商颂》为商诗，当无疑义。

可是，殿三家之后的王先谦，他坚决主张：《商颂》为宋诗。并且，认为经“皮、魏二十证，精确无伦。即令起古人于九原，当无异议。益叹陋儒墨守，使古籍沉埋为可惜也。”（《诗三家义集疏》）王氏治学自信心很强，诚可敬佩。可一动感情，就不免把问题看得太绝了。不免挟有《诗》今文家宗派主义之偏见。

现在看来，王氏所谓的皮、魏论证，精确无伦，实际上并不

那末“精确”。魏氏殷高宗不可能有伐楚之主要论点，就有大可异议之处。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起古代文物于地下，大致比王氏“起古人于九原”，要精确可靠得多。

其次谈《周颂》。关于《周颂》产生的时代，前人和近现代人的看法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但从颂诗里出现的人物称号，以推测《周颂》产生的时代。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提到周的始祖后稷。“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天作》）提到了开创周王朝大业的太王和继承并发展了周王朝大业的文王。“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执竞》）提到了克敌制胜，武功赫赫的武王和统有了天下四方的成王、康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有成命》）提到了受天命为君的文王、武王和不敢贪图安逸、日夜筹划政务以安定民生的成王。说明《周颂》当是西周初成王、康王间的产物。惟《执竞·序》说：“《执竞》，祀武王也。”朱熹认为：“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又补充说：“此昭王以后之诗。”（《诗集传》）王应麟对此也有所解释：“《执竞》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当是昭王以后之诗。”（《困学纪闻》）何楷对此，也作补充说：“《执竞》，祭成、康也。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备七庙。此日祭之诗也。”（《诗经世本古义》）那末，《周颂》应是起自西周初年，下限至昭王以后的作品。

最后谈《鲁颂》。《閟宫》诗篇有云：“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据传，奚斯是鲁僖公时代的人。他作《閟宫》，意在歌颂僖公保卫疆土，修建新庙的功德。因此，可推测《鲁颂》是僖公时代的作品，在《颂》诗中算是最晚出的了。